

美国是如何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

——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 杨帆

笔者在硕士期间专攻日本经济18年高速增长,当时国内外舆论把日本捧上天。后来泡沫兴盛,美国出版《日本第一》,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曾几何时泡沫破灭,日本停滞20年。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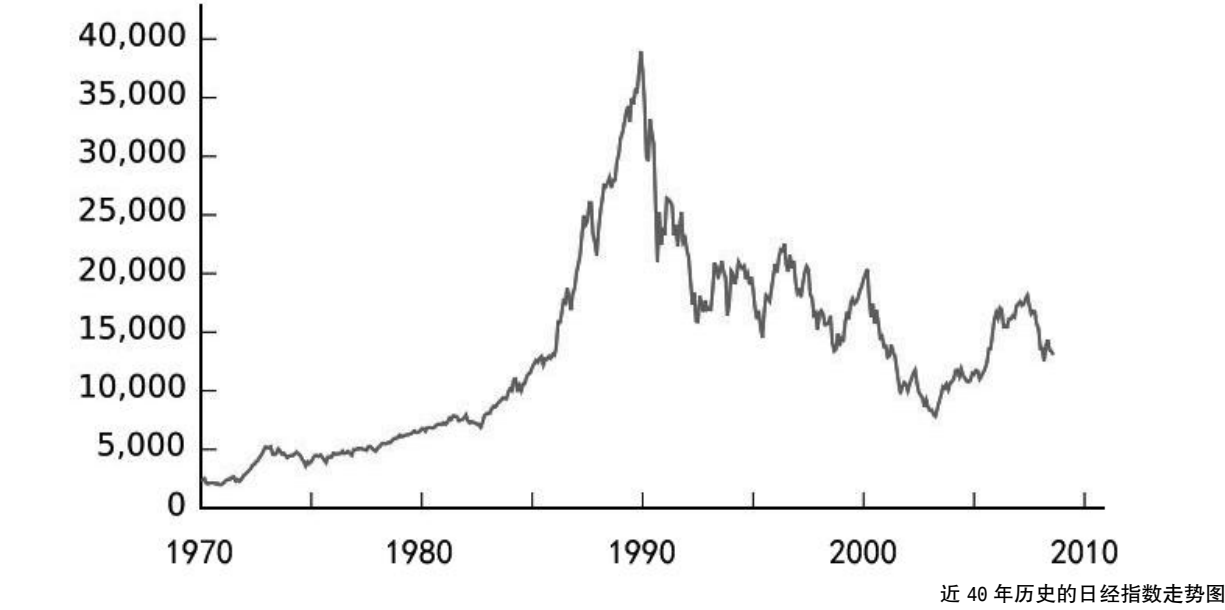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中国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促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



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长思维惯性,进退失据决策屡屡失误

日本在经济转型期追求

GDP 高速增长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10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000点飙升到39000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全美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10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万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

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形势与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国奶长大,被美国洗了脑子,他们害怕与美国对抗,也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中国仍是“主流”。他们已形成利益集团,有一整套思想理论政策,掌握了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外部压力下,我们内部会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经济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面对德国的实体文化我们感到羞愧

——八评发展实体经济

■ 胡箭

在发展实体经济中,有个鲜活的典型摆在中国人面前,这就是德国实业兴国的经验,也可称之为实业经济发展道路。细究之,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种实业文化。

在经济市场哀鸿遍野的背景下,德国实体经济发展一枝独秀。2011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是欧元区公认的火车头;出口超过10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失业率降低至5.5%,降低到了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稳步增长的秘诀就在于机器的沙沙声中——实体经济文化的胜利。

坚实的工业是德国的品牌

德国的实业经济就好像德国人的性格一样,沉着、严谨而踏实。“德国制造”已经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符号,似乎成为领先科技和精湛品质的代名词。

倘若将时间调拨到20世纪的80年代,一定有很多人记得那时候的美英经济都以发展金融、网络等虚拟经济为先进的标志,依然专注的以传统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德国模式却不被看好。如今,在各国政府受困于浮躁的泡沫经济、为金融行业套上缰绳使出浑身解数的时候,德国的机械制造、汽车、化学和电子等产业坚如磐石,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岿然不动。

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汽车制造行业屡创佳绩。2011年,德国在国外生产轿车700万辆,首次超过了国内的600万辆。大众、奔驰和宝马等汽车制造商即使面对金融危机的重重乌云,也表现出成竹在胸的信心,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以品质取信于消费者,以品牌立足于世界。除了汽车制造行业,德国的精密机械和先进技术,这些行业也是德国经济增长的来源。

在德国,随处可见作为行业冠军的企业。这些企业名不见经传,却是名副其实的行业内国际领先者。德国的这类低调的冠军企业主要是中型规模的家庭企业,是德国经济“不疾而速”的脊梁。他们绝大多数没有上市,不受金融市场的制约,也不必为迎合众多股东而牵扯精力。这些企业不浮躁、不突进,依靠着对实体经济某一领域的专业和精益求精,出口数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最大份额,是国际市场的引领者和国际产业化标准的制定者。人们可能不会相信,德国这样人称“Hidden Champions”的冠军企业有近2000家之多。

德国中型企业的底蕴和实力开创了一个经济模式的新时代。相比之下,法国中央集权的模式反映在经济领域里,是培育几家规模庞大的康采恩,但由于金字塔般坚实底座的缺位,使得经济增速乏力;意大利经济多以小企业为主,但是竞争力明显不足,使得发展缺乏后劲。

德国独特的双轨制教育体制和成熟的职工教育体制亦可称为“世界一绝”。德国10年级以后的学生,大量选择去某家企业或职业学校“半工半读”三年后成为技术人才。不同于其他的首族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领头羊,德国的教育既培养部落首领,也打造出出色的“斗士”。我们中国或者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教人去当官,或者是教授人去发财。而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制度,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为德国的实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专业的后备军。

凭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德国在工业化国家中独领风骚。而这一切的成绩都来自于德国对于专业领域的踏实和精益求精,来自于德国成熟的教育体制和对人才的重视,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腾飞和低泡沫的资本市场。

同步协调的两个轮子

德国企业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首先是坚定与自信,在艰难困苦下发展实体经济,在歌舞升平中也发展实体经济。其次是平衡与稳健,在保证实体经济是顶梁柱的环境下,也不放松虚拟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就好像车的两个轮子,少了一个不行,一快一慢也不行。德国正是通过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个轮子协调前行,使得经济这辆大车稳健前行。

其实德国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德国金融业也曾受到巨大冲击,并且危机向其他主要行业蔓延,德国的汽车、钢铁及机器制造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时的德国企业前景日趋暗淡、但是德国即使身处困境,也从未放弃稳扎稳打发展实体经济的民族精神,也从未让虚拟经济的泡沫过度膨胀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德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助于世界经济重新回到重视实体经济、依靠技术创新的轨道。虽然德国政府也像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国家一样采取了非常规的救市措施以及经济振兴计划,但是德国政府仍旧坚持秩序政策优先于过程政策,稳定和可持续性优先于需求刺激和赤字财政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并无房产泡沫,且10%至11%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较之其他国家金融相对稳定。

相比之下,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远远没有德国这般幸运。过度地投资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自由放任地吹大经济泡沫以及一发不可收拾的虚拟经济盘子,都是造成欧美诸国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在这些国家就好比脱缰的野马,疯癫起来无法操控,最终也影响了整个经济大局。

中国企业文化的“浮躁”

说罢德国,实在无颜再说下去,因为我们无法面对自己企业的种种“丑闻”。相比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注于民族发展主营产业的德国企业,中国很多企业显得是那么浮躁,我国企业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涌向房地产、金融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企业偏离主业所搞的副业不仅偏离了角色定位,更重要的是打乱了中国经济布局,给市场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吴承恩以“唐僧肉”为核心,演绎一场又一场斗争。500年后的中国人则以“钱挣钱”为核心,演绎一幕又一幕角逐。现今被称为“唐僧肉”的金融市场,多少企业蜂拥而上都想咬上一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看到各类企业都掉进了投资虚拟经济的怪圈。在央行不断紧缩银根的宏观背景下,对外放贷、购买理财产品正逐渐成为部分上市企业的“主食”,更有企业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包括温州的“胡跑跑”、鄂尔多斯“地产王”,多少企业家就是在这种以钱挣钱的游戏过程中成为2011年的“新名人”。

(下转第八版)

企业发展需要的“十个环境”

——九评发展实体经济

■ 李思贤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实体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同时也明确给出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定位,即“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短短数言,表明政府对于实体经济的坚强决心,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依旧持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政府怎样扶持实体经济,人们翘首以待。

一个约定俗成说法,便是政府要出面救市,放宽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政府对发展实体经济责无旁贷,然而政府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大有考究。

显然,政府在发展实体经济中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于投资。为应对2008年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带来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同时带来了巨大

的泡沫。但由于配套制度不完善,资金流向监管力度不够以及地方政府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了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国内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发展危机不断显现。

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政绩工程的需要,对金融业发展抱有巨大的热情,却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渐渐出现了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的倾向。金融业向虚拟经济过度倾斜的后果是金融业在自我循环中膨胀,而实体经济却出现了空心化,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

实体经济对各级政府充满希望;政府的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任务异常艰巨。弄清政府面对的现实环境,极为重要。

首先,社会大众价值观的集体偏离。过多地强调发展适度与经济效益,无形中形成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主张投机心理的膨胀和发痒。尤其21世纪以来,股市和房地产狂热

带动了整个民众投机成风,价值取向逐步向“钱”靠拢。温州炒房团和民间借贷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营资本逐渐退出实业,进入股市、楼市和金融市场,拉高股价房价的同时,也让大众社会不安全感继续加剧,跟风投机,由此进入“投机—富裕—再投机”的恶性循环。

其次,银行对实体支持不力。4万亿的投资绝大部分进入基建项目和金融市场,而最需要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得到的却寥寥无几,银行把大量资金投入给房地产开发商,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无疑是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的重要推手。

再之,地方政府对GDP的盲目攀比。许多地方政府把GDP增速作为硬指标,干部考核和选拔体制基本上还是以GDP论英雄,加剧了民众信心丧失,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恶化了发展环境。

如何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走出这场危机,政府到底应当怎么样,人们在寻找不同的答案。按诺贝尔经济学